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工具理性的光芒背后
——桑提亚戈与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批评

覃庆辉, 张叔宁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541004)

摘 要: 通过对桑提亚戈与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因素的对比, 分析现代性思想从18世纪初发端到20世纪中期走向衰微的历程, 指出了对工具理性的作用的盲目夸大是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历史局限性, 对现代性的乐观转向怀疑是历史必然。

关键词: 现代性; 工具理性; 桑提亚戈; 鲁滨逊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6)01-0081-05

无疑, 现代性思想曾经深刻地改变过人类的命运, 正是它的光芒在300年前照亮了人类摆脱中世纪的蒙昧的道路,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使人挣脱了神对人的束缚和压抑, 能够以"大写的人"的自信追求现世的幸福和自由。应该说, 对现代性的乐观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但现代性思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丰富的成果, 并不能弥合它在当今历史时期越来越大的裂缝。当前的对现代性的批评的文献指出, 现代性的危机已经成为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问题。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危机并不是现代性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特定的产物, 而是源自现代性发轫之初并一直伴随其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即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鲁滨逊漂流记》发表于1719年, 正值英国启蒙运动的开端。"现代性的态度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1] 并且, 这部小说作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之作蕴涵了丰富的早期的现代主义精神。主人公鲁滨逊是18世纪自由贸易的精神产物和人格化的体现, 在他身上寄予了对工具理性的乐观和以自我的发展为中心的人生价值理念以及人与自然主客体分离的哲学思想。而《老人与海》发表于1950年, 是现代主义走向衰微, 现代性精神遭到广泛质疑的时代。这部小说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性思想深刻的反省, 其主人公桑提亚戈的形象表现了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的背离, 对人的价值的崇高性的回归, 以及人对自然伟力的崇拜。

这两部作品分别记录了现代性思想在18世纪发轫之初的乐观和朝气和它在20世纪中叶走向衰微的暗淡的前景。这两部小说是对现代性思想的研究的重要素材, 以生态文艺批评理论对这两部小说进行对比研究, 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现代性思想的历史意义, 能更深刻地认识现代性思想的实质。

对文学中的现代性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其一, 借助生态批评理论的广阔的视野, 我们能够建立起对现代性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尤其是后者)的全面、公正的认识(这一点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尤为意义重大)。其二, 生态批评作为生态美学的实践形态, 能推动我国的生态文化建设, 从而在客观上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收稿日期: 2005-10-09

作者简介: 覃庆辉(1973-), 男, 广西柳州人,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一、神话了的技术

工具理性是现代性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启蒙主义时期,理性是启蒙者反抗宗教压迫和中世纪蒙昧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理性的光明最终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所以生活在18世纪的笛福对理性的崇拜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是19世纪以降工具理性主义的话语权利过度膨胀导致了严重的现代性问题。借助生态批评理论,我们发现,鲁滨逊式的对工具理性的乐观主义一开始就走向了生态发展的对立面,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而桑提亚戈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的深刻反省。

建立一个有中心的体系是人类早期实现秩序的主要手段。在中世纪的英国,在世俗的统治中,国王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思想哲学的体系中,上帝成为了至高无上的中心主宰了人类一切的行为的标准。生活在一个有中心的体系的世界中能给予人们安全感,它不仅能使个体的民众在日常行动和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支持,更重要的是,由系统的中心自上而下的管理是这个社会不至于崩溃的保障。中世纪的英国的城市已颇具规模,象伦敦这样的城市,已具备了初步规模的商业、制造业和农业。秩序无疑是支撑这种人类大规模群体生活方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秩序的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而当时最先进的秩序系统就是以国王、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体系。尽管他们的统治使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状态,但总比陷入战乱的无序要好得多。这一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极为清楚的。所以,秩序是所以人们享有各种生活乐趣的基本保障。但在中世纪,对秩序的维护就落在了对中心的维护上了。在英国的发展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中世纪那样对王权如此重视,对上帝如此虔诚。漫长的中世纪使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同样也使上帝在人们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同时,也造就了对"中心"的迷信——这一点对于理性最终从启蒙的火炬走向自身的对立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人在与宗教对抗的过程中,理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理性在帮助人类击败上帝之后,它的话语权利却日益膨胀,直至成为新的中心。所有的话语和评价都得围绕着工具理性的价值展开。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中心的工具理性有比上帝更大的优越性吗?

工具理性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成果,但却被放置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致使它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而成为了又一个制约人类思维和视野的因素。在以工具理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技术被过分乐观地评估,价值的体系被严重地扭曲,个人主义被过度地张扬,人性、爱和自然的价值被高高地搁置。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的生命的价值就来自于征服、探索和致富。对生命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财富的积累的多少并不能够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它们至少设计了一种有意义的生命的过程——及上文所提及的永不停息地追求财富和个体意志得到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帮助人们实现追求的核心手段,对技术的认同和崇拜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法国哲学家路易.鲁吉埃(Louis Rougier)曾经指出:"一种新的宗教在18世纪产生,以取代基督教。这就是进步的宗教。"[2] 理性就是这种宗教的上帝。受益于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者的努力人们逐渐觉醒而意识到基督的天堂不过是一个迷信,于是他们转而信奉一种尘世的完美的状态,"这是一种用人的理性建构起来的天堂(乌托邦),是人们用以寄托一切美好向往的境界。人们从此相信,人类仅凭自己的力量——理性之光的不断照耀和科技的发展,就能不断进步,最终达于理想的人间天堂。进步论由此便成为一种宗教('进步的宗教')。"[3]

我们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不止一次地读到对鲁滨逊劳作的极为细致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主义手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笛福对技术的无限崇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尽管在描写中作者尽量用客观的语气，但从情节上看，鲁滨逊孤身一人在海岛上遇上了种种的麻烦和挑战，但只要他运用技术——不管是工具性的技术，如枪支火药，还是知识性的技术，如如何恰当地利用地理环境的优势——他都战无不胜。这在现实中当然值得怀疑。但在小说中对技术的描述已经使技术上升到近于神的地位。

人经历了漫长的斗争终于部分地摆脱了神对人的压抑，但他们同时又创造了另外的神——技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技术几乎成为了神的化身或者是——神化了的技术。这是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

在老人与海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疏离技术的老人的形象。在老人与海中，帮助桑提亚戈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不是技术。而是勇气、毅力与身躯的力量。这是十分意味深长的。工具理性是人类社会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思想宝贵的财富，但由于其错误的定位，使工具理性承担了它太多的力所不能及的义务，这为整个理性与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的发展的挫折埋下了伏笔。

二、泛标准化的工具理性

笛福在描述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征服上，已经显现了技术价值中心的价值取向。在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中，鲁滨逊是以文明人的高姿态与星期五对话的。如果进一步分析，是什么赋予鲁滨逊这样的地位构成他居高临下的姿态？从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让鲁滨逊获得对星期五的关系中居高临下的地位的原因是文明人，是因为鲁滨逊是“文明人”，而星期五是“野蛮人”。而文明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基督教与技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工具理性价值与非工具理性价值的对立，技术与非技术的对立，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对立。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征服不仅仅表现的是作者对技术力量必胜的信心，是技术力量与非技术力量对抗中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这种征服的态度显现了极其严重的中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征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笛福对非理性中心文化的歧视的态度——似乎还不是歧视的问题，在工具理性的中心思想指导下，其他的文化已经成为了有害的落后的必须改造征服的东西。

事实上，鲁滨逊的形象已经向读者清楚地展示了现代文明在发轫之初的反生态特征。文明是一件漂亮的概念外衣，当技术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后，技术就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我们知道，有悖于文明的即是落后的就应该被改造，换而言之，有悖于技术发展的或有碍于技术实施的也应该被改造。本来技术作为手段与其他的手段一样有其有益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作为文明的代言人的技术，却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技术水平的高低成为了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技术改造程度的高低成为了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实际上，在现代性思想的体系里，理性的概念成为了权力的工具：它不但成为在认识与行为甚至排斥或压抑非理性的借口，而且成为了有权力者用来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文化的借口。”[4] 这一切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对星期五的态度上就已初具倪端。鲁滨逊终于把星期五改造成了一个出色的基督教徒。对此，他志得意满地说，“我从上帝的语言中轻而易举地理解了上帝和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意义。仅仅读一下《圣经》，我就能明白自己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担起赎罪这一伟大任务。”[5] 在这里，鲁滨逊是技术的掌握者，因此他是文明的，而星期五是低级的技术掌握者所以他是野蛮的。高技术对低技术的替代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但认为这种征服是理所当然的并是必须的态度就十分令人怀疑了。这种态度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歧视的意识。作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技术所包含的人文价值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文明几千年沉淀的其他的财富，更不能作为征服其他文化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现代性的革命——在推翻了神的独裁统治之后它自己却建立起了以自己为独裁者的新的统治——它变成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了自己革命的对象。它必然会导致另一轮被压抑的力量对它的讨伐。六十年代后的后现代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七十年代的生态运动就是对现代性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话语的反驳。

桑提亚戈的形象则体现了对技术的疏离。他生活在一个现代性已经得到充分张扬的时代，在那里，技术已经完全渗透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技术不再像在鲁滨逊的时代作为一种新生力量而充满憧憬，此刻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现实。海明威以其冰山原则的冷峻著名于世，他绝对不会把笔触浪费在毫无用处的地方。所以，尽管他在《老人与海》中对现代技术只有寥寥几笔的描写，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位作者对技术深刻的反省。技术在这里不再是人与自然斗争中人战无不胜的法宝，相反，技术的泛滥是对老人所生活的渔村的淳朴的文化的破坏。如果我们把一百年前笛福对工具理性与技术的幻想与一百年后的现实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笛福的乐观显然过于轻率了。

《老人与海》，尽管以一个开放的结尾呈现出了一个未知的结局，但整个作品中凝重的悲观主义的色彩还是流露了出来。老人的失败，是人类的必然的失败，是工具理性的理想的失败。当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态度——在技术的帮助下，不断征服、获得财富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但桑提亚戈却深刻地认识到："走得太近会一无所获，走得太远又会得而复失"工具理性在桑提亚戈那里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法宝，资本主义精神中无休止的欲望也不能成为人类走向福址的根本动力，这些在老人那里仅仅是非常有限的适可而止的力量。所以老人对技术的依赖也是十分有限的。他对那些用拖网捕鱼的行为不屑一顾——他们在物质欲望的追求上显然走得太远了。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呈现出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欲望的无止境的扩张吞噬了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给人带来的满足感，而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效率原则在社会的实践中导致了人类关系的异化、劳动的幸福感的丧失以及精神的荒原等一系列问题。《老人与海》发表在五十年代，上述问题已经成为了众多批评家口诛笔伐的目标，但在上帝缺席的世界里人们无所适从，工具理性的价值在这里大打折扣，他已经沦落为解决局部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像在二百年前是人类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与压迫的力量抗衡的利器。可以说，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迷惘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对工具理性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效力的怀疑开始的。当一个处于精神支柱的因素瓦解时，而人们却不能及时找到一个新的替代品，那么，普遍的精神的空虚就会袭来。老人桑提亚戈的悲剧式的英雄主义，是否能成为这个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世界的良方呢？

老人连续八十三天打不到鱼，难道仅仅是背运吗？桑提亚戈的贫困的生活仅仅是一个特例吗？这是现代性必须产生的结果之一吗？尽管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里富裕与普遍贫困的矛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所缓解，但巨大的贫富差别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之一。老人的贫困并不仅仅由于背运，他和成千上万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各行各业的贫困者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技术万能论在矛盾重重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人们终于认识到技术的有限性——无论是作为精神的支柱还是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它的作为都是有限的。

三、结束语

尽管奥塔与哈贝斯在现代性终结问题上有着激烈的论争，但现代性思想体系在西方各国普遍进入后工业时代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广泛的质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质疑一方面缘于工具理性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如主客体分离、精神荒原、人的崇高性被解构等问题。另一方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对宇宙认识的进一步认识加深使技术万能的现代性乐观主义遭到怀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尽管目前仍然处于不明确的状态, 新的文化体系正在被构建,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是: 在对宇宙的认识上, 从牛顿的经典力学走向量子力学, 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度上, 从技术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在老人桑提亚戈的身上我们依然读到了太多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世界的认识论模式, 但从鲁滨逊的乐观到桑提亚戈的迷惘我们却欣喜地看到: 尽管依然矛盾重重, 但我们的世界正迈向和谐。正如海德格尔在对现代性的发展的思考中曾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句: "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6]

参考文献:

[1] 陈嘉明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
[2] Louis Rougier: Du Paradis a l' utopie, Copernic, Paris, 1979: 125.
[3] 河清.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69.
[4] 米歇尔·福柯著. 疯颠与文明[M]. 刘北成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57—58.
[5] 笛福著. 鲁滨逊漂流记[M]. 张蕾芳译. 海口: 海南出版公司, 2000: 166.
[6] 海德格尔著. 面向思的事情[M]. 陈小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4.

Beneath the Glory of Rationality ——On the Image of Robinson and Santiago from the Pespective of Modernity

QIN Qing-hui[1], ZHANG Shu-ning[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reflection of the image of Robinson and Santiago,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 the modernity between the tow heroes and reveals tha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s a historical problem now is caused mainly by the abuse of the rationality and that the skepticism to the modernity is a historical trend.

Key words: modernity; rationality; Santiago; Robinson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